



【言为心声】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照顾到企业员工的利益,与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相比,是巨大的进步。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旧瓶装新酒

乔新生

对于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争议较多。有人认为,中国联通所有制改革没有坚持国有控股的基本原则,反而在改革过程中,通过职工持股方式将国有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职工的企业,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这项改革不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有人认为,中国联通对员工持股定价仅仅为停牌前股票价格的一半,但是,这样的价格仍然高于每股净资产,因此,这项员工激励机制改革方案是可行的。相比较过去实行的“管理层收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笔者认为,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同股同权,而且改革充分照顾到企业员工的利益,与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相比,是巨大的进步,而不是旧瓶装新酒。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国有企业,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中国联通之所以成为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头羊,是因为中国联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随着语音服务、数据服务收入不断下降,中国联通在中国基础通信产业领域处境越来越困难,将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合并,当然可以解决中国联通面临的问题。但是,如果把中国联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试验田,引入战略投资者,吸引民间资本,增加职工持有股份比例,那么,可以为中国联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中国联通在改革过程中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央之所以选择当前这种改革模式,一方面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民间投资者提供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机会,通过改变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提高国有企业治理能力和市

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为中国其他国有企业改革积累经验,从而使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积累的庞大资产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中国联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企业内部出现非常明显的矛盾,战略投资者战略决策与国家战略决策发生分歧,那么,可以通过股权回购等方式,让中国联通重新成为传统国有企业。总而言之,中国联通作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先行者,有可能会成功,也有可能彻底失败。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给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带来有益的经验。

中国联通改革的确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澄清的地方。虽然中国联通按照信息披露制度发布系列公告,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公众疑问。但是从整体而言,中国联通改革还有待时间检验。

中国联通股份制改革不是通过挂牌竞价收购,没有遵从现行证券交易规则,这本身说明中国联通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之后市场的反应并不能说明改革是否取得成功,而只能说明投资者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充满憧憬。中国联通恢复挂牌之后股票价格迅速上涨,不排除一些投资者搭便车,他们看到战略投资者加盟让中国联通“财大气粗”,在未来市场竞争中有可能把先机。这是一种投资未来的表现,但并不能说明投资者都是长期投资者或者价值投资者。中国联通改革之后,如何进行战略决策,治理结构调整之后,如何在中国基础通信产业领域竞争中脱颖而出,所有这些都值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笔者之所以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走民主决策的道路,是因为国有企业本质上属于全民企业,其改革牵涉每一

个公民切身利益,因此,不能暗箱操作,更不能通过协议方式实现股权转让。此次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之所以大刀阔斧,对中国联通核心资产和经营业务进行改革,并且彻底摒弃了国家绝对持股的方案,可能是为了增加中国联通股份制改革的吸引力。但是,这样的改革的确存在市场风险。

但不管怎样,中国政府有足够能力维护中国通信安全,有足够能力保护中国国有资产。如果外国资本通过间接方式进入中国传统产业领域,试图对中国通信市场施加影响力,那么,中国政府一定会通过修改规则,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对中国联通股份制改革过激揭露完全没有必要,这场改革牵涉到普通公众利益,因此,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至于改革成效如何,让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庙堂江湖】

如果政府真的觉得有必要改善老人的居住状况,也应该直接补贴所有的老人。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德政”应缓行

沈凌

最近有媒体报道:杭州市政府正式确定在上城和江干两个区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先行试点,并认为这是一个“民生工程”,为此还要动用公共财政,补贴每部电梯20万。而这样的政策动议在不少地方都有,比如上海也讨论过很多次,也有不少先行试点的政策。

但是这个政策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它涉及到了利益冲突的不同人群,把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任意地再分配了;同时也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

非常容易造成政策套利行为,留下了腐败的空间。

政策的出发点当然是好意,主要是为了解决住在高层的老人没有电梯上下楼梯不方便的问题,比如杭州目前60岁以上老人就有20%以上,这些人有一部分住在没有电梯的旧房子里面,所以,财政补贴加装电梯是有益于老百姓的“民生工程”。

但是政府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好意”是有偏的,因为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从建成之日就被所有业主都知晓的公开信息,而没有电梯的高层住宅,由于不利于住户上下,其价格也远低于

低楼层的住宅。比如这些多层住宅出售的时候六楼的价格往往是三楼的80%-90%,一套房子300万的话,这个差价就有至少30万。这说明:市场价格已经对不同楼层的住宅给出了合理的补偿。换句话说,现在住在高层的老人虽然不方便,但是过去他们已经通过低价格得到了补偿,现在再动用公共财政补贴他们加装电梯,实际上就是对原来用高价格买中低楼层老人的不公待遇。

更何况,如果老人觉得住在高层不方便,完全可以置换到低楼层住宅去,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继续住在高

楼层,为什么他们过去得了便宜,现在就要全体市民去补贴他呢?

加装电梯的本质是改变了不同楼层住宅的相对价格,因为带电梯的高层公寓,每高一楼层,单价往往会提高数百元不等,一套公寓也就相差数万元。而这样动用公共财政补贴电梯的最后结果实际上是把私人财富从低楼层的住户手中转移到高层住户手中,既不合理,也不公平。而且会形成套利行为(一旦这个政策实施,那么会有人现在就去买入廉价的高楼层住宅,加装电梯以后再高价出售),这样对市场行为造成了人为扭曲,也为行

政行为留下了寻租和腐败的空间。

如果政府真的觉得有必要改善老人的居住状况,也应该直接补贴所有的老人,而不是补贴所有住在高层的住户,而让低楼层住户损失家庭财产。而且对老人的补贴也应该一视同仁,而不是只补贴住在高层的老人,不补贴住在低楼层的老人。因为高层的老人或许有上下楼不方便的问题,但是低楼层的老人也有阳光少的不舒服问题,难道我们应该让居住在低楼层的老人全部搬到带电梯的高楼层去吗?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缘木求鱼】

商人赚钱赚够了,开始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思考一下人生的终极问题,以摆脱“本能”的宿命性束缚,终究是好事情。

商人的精神追求要肯定

木木

在中国的历史上,商人的形象好像一直不太正面。

于士大夫们看来,“商人重利轻别离”,个个都是无情无义之輩,显然不可靠;尤为重要的是,一个连自己的家庭都搞不掂,顺不顺的人,就更别提能有什么其他更大的作了。于老百姓而言,商人的形象仍旧没什么起色,几乎也都是钻营私利、损人利己甚至丧人之危的丑角色,于是被戴上一顶“无商不奸”的帽子也就毫不奇怪。

这样的形象,入正史当然就很难,偶有几个比较正面一些的,留下的也是只言片语,鸿爪雪泥,风一吹,雨一打,往往也就痕迹难寻。这样千百年的坚持下来,后继之人往往就有了思维范式,商人入史难、留名难,几乎没有存在感,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此,

甚至连商人自己也认了命。

时至今日,好像是换了人间,主要标志就是,商人们的地位似乎大大地提高了,而地位大大提高的主要标志就是,商人们也能站上讲台,四处开讲了。但开讲易,入耳难,积习从来难改,要想让“圈内人”抱了平等心听进去,一时半会儿还不是件容易事;或许随便讲讲还凑合,一旦想认真地讲,还讲的是艰深的哲学问题,没准儿就要惹来一团怨气,仿佛动了人家的禁商。

前段时间,马云在一个论坛上略微谈了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需要重新定义,市场经济不一定就比计划经济更好”的问题,而刘强东呢,更厉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并非遥不可及,很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由此,二人都得了一个新外号,分别叫“马计划”、“刘

共产”。

二人谈论的都是很深的哲学问题,不过谈论的角度很新颖,都是从技术角度出发,共享了一下自己的思考。其实,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开诚布公地谈论讨论自己对一个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在今天这个时代,大约应该算得上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吧;尤其是两个埋在钱堆儿里的商人,居然肯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艰深的哲学问题,并能坦诚地把自己的认识跟大家分享,好像无论如何都应该鼓励才是。但现在人家一张嘴,许多人就马上有了激烈的反应,甚至有炸窝之势,反而就有点儿不正常,仿佛野蛮人要进城一般。

也是,“野蛮人”一谈文化,“文化人”大多马上就会不舒服。其实,大可不必。

商人赚钱赚够了,衣食无忧了,开始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思考一下人

生的终极问题,以摆脱“本能”的宿命性束缚,终究是好事情,这总比整日花天酒地,或者摆弄“庞氏迷魂阵”甚至满世界买大房子要有意义、值得肯定得多。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有精神追求的“野蛮人”其实已经很多了,只不过有些文化人往往故意忽视罢了。

不过,你忽视不忽视,原本也无所谓,但你不能挟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硬堵人家的嘴,不让人家说话,这就不对;如果文化人总干野蛮事儿,那么“野蛮人”文化地回击起来,你往往就很难招架得住,不服气,偏要死命地招架,没准儿人家的回击就更凌厉,你露出的破绽就越多,闹到最后,很可能就斯文扫地,下不了台。

文化人容易有这样毛病,即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真理牢牢在握,而容不得一点儿不同的声音。这很不好。对企业家学习哲学、思考哲学问题、交

流心得体会,整天躲在上层建筑里“用功”的文化人,最好还是持开放心态的好,不同意人家的观点没关系,大可以辩一辩,这样,起码于自己的学问有利,于自己最终的尊严也就有助益。

据说,华为新员工入职仪式上,任正非总要惯例性地号召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一点儿哲学,尤其那些有志于管理岗位的、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的员工,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华为能发展到今天,或许,任正非布置的这个“作业”,多多少少还是发挥了一点儿作用吧。

有精神追求了,哲学学好了,人就不太容易迷失。从这个意义讲,商人们开始了精神上的追求,开始谈一些哲学问题,终究是件好事。或许,这样一路坚持下去,其历史地位,才有真正改变的可能。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环宇杂谈】

保温杯与中产危机,折射出当代中年人(甚至年轻人)工作和生存的状态:日益功利化。

保温杯里可敬的情怀与可怕的老成

李宇嘉

人人一个手持终端的互联网时代,从不缺乏戳中泪点和痛点的话题。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后的艰难转型期,微观社会遇到种种不适、恐慌和害怕,相关话题往往会擦起广泛的共鸣,有认同者,有自嘲、群嘲者,也有吐槽者。这不,一个很普通的、用来喝水的保温杯突然“火”了,缘由不用再赘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演奏了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无地自容》的黑豹乐队,其鼓手赵明义近日手持泡枸杞的保温杯,引发了“缺一样的男人也会老”的感慨和共鸣。

很快,保温杯话题演绎到“中年危机”、“中产危机”上。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借着保温杯的“东风”又了刷一次屏。各路媒体还在继续发酵,比如

“一入中年百事哀,中年之后更无奈”,现在赚钱的IP都打“青春牌”,这个世界是不是看不起中年人了?生活被今天的苟且和未来的苟且充斥,整天为KPI打拼的“加班狗”,还有奋发的朝气吗?正在升级而上,事业、健康、婚姻上正爬坡过坎的中年人,有此共鸣是减压的随意呐喊,还是真的为了是非曲直鸣不平?

一个保温杯引发的舆论案子,主流媒体也被惊动了,大有思想上要披乱反正之意。笔者看来,大可不必如此。望眼全球,自古以来在勤劳(甚至是拼了命一样的勤劳)能赶得上中国的,就没有几个国家。更何况,我们现在正处于高速增长后艰苦卓绝的转型期,牢骚一下现在的压力和困苦,以及被“年龄”这条恶狗的追赶下,为未来竞争的优势担忧,彷徨,这没什么大不

了。过去也有,只不过过去没有互联网,且互联网上可以不实求是地、夸张地宣泄。

对30多岁的“80后”呼喊中年危机,不要夸大他们的压力。比如,很多人认为80后是最惨的一代,上学经历大学扩招,进入社会经历就业压力和高房价,中年后经历计划生育政策下的“421”家庭,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老了以后,经历老龄社会下的空巢危机。当然,也不能夸大他们的傲娇与不作为,比如80后中意的RAP,怎能比得上赵明义血性的《无地自容》(赵明义或为了事业第二春而喝枸杞);WIFI造就的一代“低头族”,怎么有奋斗者的激情?

就国人而言,没有哪一代人的中年是容易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宿命、委屈、挣扎、奋斗,没什么可抱

怨的。每一代人,有选择奋斗和拼搏的,也有选择安逸和清谈的。当然,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机遇。互联网风靡的今天,80后无疑是弄潮儿,比如滴滴、大疆无人机、光启、汉鼎、饿了么等,都是80后创建的知名科技和互联网企业。只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不变,基于示范效应和经济利益激励,由个体内心激发出的“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式的奋斗就不会停。

疾驰的工业文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二者带来的是激烈的竞争。互联网与一切“加起来”,其带来的示范效应,则将这种竞争置于更白热化的境地,也有意或无意放大了竞争的惨烈程度或后果。比如,35岁的招聘或跳槽“门槛”,再比如前一阶段传得沸沸扬扬的华为清洗40岁以下员工等,事实上这些都不是事实。但信号不断被

传,就成了信念,即你随时保持奋斗的锐气,不断地向上攀爬,否则可能随时失去竞争优势,或在社会标榜的阶层流动中掉队。

互联网取代传统媒体,好处是更接地气,保温杯与中产危机,折射出当代中年人(甚至年轻人)工作和生存的状态:日益功利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个诗意当道,人才辈出的年代,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而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人很多。现在,大学生选专业看就业好坏;很多人读书,要看有没有用(考试或考证);多数时间忙于赚钱、买房,甚至套上阶层或圈子攀比的枷锁。如此,怎么可能不会中年老成,甚至少年老成?所以,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环境。

(作者供职于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